

副刊 Books 書海漫遊



自甘「墮落」的青年教師



「搞關係」的業務員 愛講怪故事的文化教員



「特嫌」纏身的技師



活·的·歷·史 總·隱·在·暗·處



▲楊奎松，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 網絡圖片

「邊緣人」一詞源自德國社會心理學家庫爾特·勒溫，指那些困難以適應地位或環境改變而滑落到群體邊緣，無法融入社會主流的人。《「邊緣人」紀事：幾個「問題」小人物的悲劇故事》所考察的對象，或多或少都受過教育，多半都在一九四九年前有過工作經歷，一九四九年以後或在政府機關，或在工礦企業，或在軍事部門，或在學校醫院，或在服務行業工作。他們的共同特點，除了都是單位人以外，最主要的就是都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

尼 三

這些「邊緣人」是歷史舞台上的小人物。他們生活在大人物的強光所形成的陰影之下，被主流所嫌棄。楊奎松以歷史學家的手電筒照向這些暗處，用大量史料重構了他們的人生，讓讀者近距離地觀察到歷史的另一面。

「小人物」帶來的大思考

錢穆在他的名著《國史大綱》中說，對本國歷史要有一種溫情和敬意。我想再引申一句，這種敬意和溫情，主要應給予被歷史裹挾、被動前行的人們，尤其是那些被歷史絆了一跤的「小人物」。陳寅恪也曾說過，研究歷史應具一種「了解之同情」。我也想引申一句，這種「了解」「同情」，主要也應投射到那些「小人物」身上。一滴水可以照出太陽，也足以映出歷史之河的走向。如楊奎松所言，學問之所以存在，是為了改善人類的生存。《「邊緣人」紀事》研究的是「小人物」，指向的問題卻是宏大的，可以激發人們對共和國史的不盡思考。

譬如，新中國的建立是一個除舊布新的過程，在接管舊政權的同時，也接收了一大批維持政權機器運轉的「小螺絲釘」。

在宏大敘事面前，這些小螺絲釘是面目模糊的，只有當史家的思緒探入他們的個體史料，歷史才活泛起來。中醫「方立仁」擔任過國民黨縣黨部執委，在悔過登記中又隱瞞了自己曾在一九四七年兼任過中統在縣黨部的通訊員這件事，而被認定為「歷史反革命」；解放前的技術幹部「羅國正」也面臨類似的問題，他參加過國民黨，還參加過武漢陸空聯絡訓練班，多年來一直成為公安局的「重點調研對象」。他們跌宕起伏的人生，反映出新政權執掌者忐忑、搖擺的內心世界，也足以深化人們對這段歷史「了解之同情」。

在書中，也還可以讀到「問題人物」當年的片斷日記。一則記於一九五四年的日記這樣寫到：「古時的幹部是通過科舉而得，而現在的幹部是專門學校培養；不過古時的宰相可隨便隨時更換，可現在的總理是一輩的官銜，決不讓有才德的農夫去做總理，決不能讓有才德的兵卒去任總司令。這倒不如古朝了。」哦，原來在輿論一律、高呼萬歲的時代，質疑和抗議的聲音依然在倔強的生長。這些，都讓人思考在國家機器強大不可一世的面具下，還隱藏着些許不安。也正是這些不安，讓人燃起對人性的希望，並努力去「懂得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命、權利和尊嚴。」

邊緣史料的逆襲

對歷史的理解，有賴於史料的擴充。從這個意義上說，「史學就是史料學」這句話有一定道理。因此，看一部史學作品，首先不妨看其對史料的掌握和運用。在《「邊緣人」紀事》這部書中，作者使用了「認罪書」「悔過書」「大字報摘抄」「×××問題的調查報告」「歷史自傳及思想變化情況」「思想匯報」以及個人日記等材料，與一般的「正史」寫作相比，這些史料無疑是邊緣的，在以往的近現代史或共和國史敘事中使用並不多，偶有使用，也只是作為點綴。這讓我想起，前些年有位史學家以一人之力著二十世紀中國史，獲得如潮好評，受人矚目的一點是使用了一些新史料，但這些新史料的作用其

實止於增加閱讀的新奇感，沒有衝擊傳統的敘述框架，也沒有提供多少新知。個中原因，除了突破傳統史觀本身所具有的難度之外，還在於這些新史料不夠「邊緣」，不足以對處於中心的話語體系產生足夠大的衝擊力。楊奎松卻對邊緣史料作了充分的運用，三刀兩斧刻出了一組「邊緣人」群像，擴充了人們的認識。

或許是因為運用史料技術的高超，楊奎松筆下的歷史有濃郁的故事感，總讓人有一口氣讀完的衝動。無論是以前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西安事變新探》，還是這本《「邊緣人」紀事》，都是如此。其實，歷史本就是講故事。文史融通，是中國史學的舊傳統，也是現代西方史學的新追求。司馬遷的《史記》是文史融通的典範之作，西方史學家娜塔莉·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也兼具文史之美。楊奎松撰述「問題」人物的故事時，也融入了自己的感情，畢竟，這是當代中國人親歷的往事，作者本人還曾戴着「現行反革命」的帽子經歷過監獄之災。紀錄這些往事，是寫史也是作文，因而引人入勝。

但同時，楊奎松又以史家所必要的清醒和冷靜守住了言說的邊界，止步於「過度闡釋」的崖邊。他所做的，是說明問題人物當年的「問題」與他們坎坷命運的關係，而不是為他們辯白。他說：「故本書所提供的，基本上還是一種社會史的研究素材，而且也不去嘗試還原傳主個人歷史的全部真相。此點還請讀者鑒察。」換言之，楊奎松在書中提出的是一種對人生描述或解釋，而不是探求所謂「真相」。

史學當然以求真為首要目的，但微小的個體終究無法獲知終極真相，即便掌握再多的史料亦是如此。錢鍾書在為汪榮祖《史傳通說》一書作序時說：「求盡則盡無止境，實實則實無定指。積材愈新，則久號博稽周知之史傳變而為寡見闕聞矣。着眼迥異，則群推真識圓覽之史傳不免於皮相畦執矣。」這段話對史學意義上的「真」作出了極為精到的解釋，《「邊緣人」紀事》可謂深得個中三昧。



▲楊奎松著《「邊緣人」紀事：幾個「問題」小人物的悲劇故事》，今年三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網絡圖片



▲《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二〇一二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網絡圖片



▲《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二〇一五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網絡圖片

有多少故事隨風而逝

尼 三

讀共和國史，經常能看到一個詞，「一風吹」，大意是一筆勾銷，既往不咎。某個大人物會很大度地對犯「錯誤」的人說，「你的問題一風吹了」，有時候還會接一句，「歡迎你回到人民隊伍裏來」。當歷史的大幕拉上又第二次拉開，《「邊緣人」紀事》的主人公，自甘「墮落」的青年教師、愛講怪話的文化教員、「搞關係」的業務員、「特嫌」纏身的技師、成功改造的舊警察、身敗名裂的團支書、提心吊膽的大夫、療養院的「反革命」……大半接到了「摘帽通知書」，當年壓得他們抬不起頭、直不起腰的那些「問題」被慷慨地宣布「一風吹」了。其實，歷史或許被覆蓋，但無法「一風吹」。史學家如同穿梭於不同時空的捕

風者，以敏銳的嗅覺在故紙堆中尋找和講述那些所謂被「一風吹」了的往事。他們是怎麼變成「問題」的，成了「問題」之後的他們，僅僅是在高壓下被動地生活嗎？我們又如何探知「問題人物」真實的處境和心境？本書提供了部分答案，有些絕非「想當然」所能獲知。以「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廖學昌為例，他本不是一個戀家的人，許多年來，因為被管制等原因，廖所在施工隊雖然離家不算很遠，但他平時幾乎從不回家。他的思想匯報也好，其他文字交代材料也好，也幾乎從不主動提及家庭子女的情況。隨着改造的深入，廖的價值觀發生了變化，對家庭和子女漸漸重視了起來，開始頻頻提及這方面的情況，能夠很明顯地感受到

他對家人的處境開始較多地給予關心，自己也從和家人十分短暫的相處中開始感受到某種親情的溫暖，並因為家人處境的轉好而對政府感念不已。廖學昌在一次匯報中，動情地提到他最後一個在農村插隊的兒子，被組織批准頂替退休的妻子在商店裏做售貨工作。這更增加了他對政府的感激，表示「更不能放鬆自我改造，更要努力，頑強地改造自己，以不阻礙他們進步」。於是，廖學昌從被動演變為主動入戲。他自覺自願地坦白、悔過、勞動，追求的不僅僅是摘掉頭上的帽子這樣「功利」的目的，而是努力把自己真正改造為社會主義「新人」，重新回歸「人民」的行列。思想改造竟增進了家庭感情，而家庭

關係的改進又促進了思想改造，這是否有些匪夷所思？但事實確實如此。當我讀到這一段，忽然想起《耳語者》這部反映斯大林時代的作品中曾寫到，古拉格改變了很多「政治犯」的價值排序，在進入古拉格之前，他們在自己職業或理想中尋求滿足，但古拉格的經歷卻使他們轉而重視家庭的價值。這兩個案例發生的時間、地點差異頗大，卻驚人的相似，着實耐人尋味，我相信，看似溫馨的轉變背後必定是極為痛苦的心理煉獄。而這種「佛已樂在地獄」的荒謬，更讓人膽戰心驚，從靈魂深處升起「細思極恐」之感，並從人性的角度對這段歷史進行更加深刻的反思。我想，這也是《「邊緣人」紀事》值得細讀的根由所在。



▲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著《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二〇一四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網絡圖片